

#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兼论劳动投入视角下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绩效

李子联

南京大学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促进了城镇就业的上升,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刑事犯罪活动的发生,两者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以此为思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我们的研究得出: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第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高额储蓄率和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源自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第三,我国的收入差距在经济转型期促进而不是抑制了经济增长,但其所引致的以高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收入分配;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转型期特有的“民工潮”一方面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威胁,两者将有可能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 一、文献述评

从劳动投入的角度,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渠道来进行传导的。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Lewis(1958)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 and 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转移充分地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增加了社会的总产出;Todaro(1969)指出转移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还取决于迁移者能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由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依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而做出,即取决于预期收入差距;秦华和夏宏祥(2009)的研究得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原因,当今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现象,既能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又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农村和城市均得到良性发展。

收稿日期: 2010-11-08

基金项目: 此项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7&ZD009)“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资助。

作者简介: 李子联,江西赣州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资源再配置等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认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在于产业间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正是劳动力要素从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史耀波和李国平(2007)指出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过剩的劳动力等因素诱发的劳动力移民,是劳动力要素在区域与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要素回报率,改进了贫困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分工参与程度;周靖祥和何燕(2009)考察了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多重性作用,其中,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将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区域方面却存在着显著差异。此外,就要素投入而言,蔡昉等(2001)分析了劳动力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胡鞍钢和熊义志(2000)则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体而言,上述传导机制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正面效应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对于这一过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王国定等(2006)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二元用工制度”和“城市二元社会”对我国的产业升级、产业布局、国际竞争力和城市化进程等产生了消极影响;方秀娟(2005)则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部分人群的“义愤犯罪”,同时也使得一些有劣迹者在急于享乐和寻求刺激心理的驱使下从事违法活动以捞取钱财;另外,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黄少安和陈屹立(2007)综合考察了居民收入差距、教育水平和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刑事犯罪率上升的影响,认为城市化进程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在这里,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解为城市化进程的伴生现象,那么也可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更多的犯罪活动,因而抑制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客观地说,已有文献对收入分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开阔的研究视野。然而,已有的大部分文献重在揭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其中的影响机制则仍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已有的文献侧重于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而对于其负面影响的分析则少之又少。实际上,分析收入分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固然重要,但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或许更具有意义;侧重于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积极效应对于鼓励农民自主创收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但忽视这一过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很难全方位把握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以此为切入点,本文拟以新古典经济增长范式为研究框架,从劳动投入的视角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

## 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视角

从劳动投入的角度,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源自于收入差距对低收入阶层的正向激励。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目标在于脱贫致富成为社会分化中的另一极,主要有两个渠道:从长远来看,提高受教育水平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是低收入阶层获取社会资本脱贫致富的根本性措施,但其特征在于投资成本较高及回报周期较长,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面临较多的约束;从短期来看,能够提高收入的最佳选择在于进城务工。这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结果,原因在于:农业对于劳动力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工业和服务业,甚至要高于后两者。但是,较高的农业投入以及较低的农产品价格使得农业生产无利可图,农民收入低下。从投入与产出应成正比的关系考虑,农业和二产业、农村和城市以及农民和其它职业从业人员均存在收入上的不对等,而放弃农业,将剩余的劳动力转向城市则是较为理性的选择。这样说来,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促使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工业用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要素。

假设 1:中国转型期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即是说,在一定条

件下,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也就越高。

收入分配差距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投入产生了“激励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更加明确了家庭成员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收入分配差距使微观个体发现,整个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并不能有效提高生活水平,而将青壮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厂务工则能够获得更多的总收入。由于家庭成员各自从事了不同的职业,因此劳动投入比以前更多了。第二,总体劳动时间得到延长。收入分配差距对于穷人的激励在于摆脱贫困,这就使得在有家庭多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将充分配置资源,在不具备更多劳动力的情况下则将增加劳动时间。第三,劳动强度得到强化。收入分配差距之所以使低收入阶层从事了更高强度的劳动,原因在于原本多人合作共同从事一份职业的劳动模式,现在却为多人各自单独从事多份不同的职业模式所取代。因此,社会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分工的形成、劳动时间的延长以及劳动强度的强化使得劳动投入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突然增加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假设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劳动总投入,促进了经济增长,因而具有“激励效应”。即是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越高,劳动投入就越多,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收入分配差距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对社会劳动投入带来正向“激励效应”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负向的“抑制效应”。因为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强化意味着通过正当的劳动解决生计问题将使劳动投入加大,况且这种情况下的劳动所带来的回报也极为有限,因此一部分人将寻求一种只需更少投入即可带来更高回报的工作,比如抢劫、诈骗、走私及卖淫等犯罪活动。虽然这些工作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但相对于进厂务工来说,它已经是高收入的“职业”了。从事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必然是从正当劳动生产中分离出来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种浪费。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也极有可能因其不良导向而造成社会劳动投入的减少。不仅如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抑制效应”还体现在其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上。这是因为,相对于失业和贫穷而言,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更易激发底层人们的不公平心理,更易形成群体性的“愤怒”和“抵触”情绪,更易触发社会的阶层矛盾。这种紧张的社会心理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诱导极易导致犯罪活动的发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假设 3 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我国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因而对经济发展具有“抑制效应”。即是说,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越高,犯罪活动就越猖獗,经济增长也就越慢。

总之,从劳动投入的视角,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体现在图 1 上,即收入分配差距激励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而这一结局也将从城镇就业和刑事犯罪两方面进一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可能在增加城镇就业进而产生“激励效应”的同时,也极有可能带来了我国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因而产生了“抑制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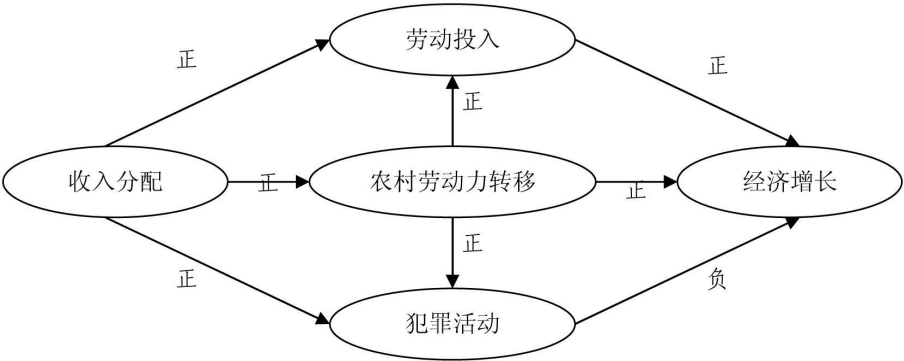


图 1 劳动投入视角下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 三、变量设置与假设验证

本文实证部分的研究思路为: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下, 以我国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 以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城镇就业率和犯罪率的相应交叉项为调节变量, 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关指标为控制变量构建线性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并通过估计检验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

#### (一) 变量设置

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的研究思路, 我们设置的变量具体包括:

GDPR——经济增长率, 不变价(上年 = 100)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用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为本文的因变量。

UR(URNR)——城乡收入比值,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 它一方面反映了收入分配的城乡格局,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

TR( TRAGR)——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其定义及计算公式参照 Hu(2009)的方法, 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h = \frac{H_{t+1}}{I_t}$ , 其中  $H_{t+1} = (I_t^A - I_{t+1}^A) + n I_t^A$ , 公式中  $I$  表示劳动力, 上标  $A$  表示农业, 下标表示时间,  $n$  表示劳动力的增长率,  $H$  表示劳动力在某个时期净转出农业的数量, 它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两个时点上农业劳动力存量之差, 二是按照总劳动力增长率计算的农业劳动力在该时期的增量。

ER( EMURR)——城镇就业比率, 城镇就业人数占城乡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城镇就业数量的变化。因此, 也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投入的影响。

CR( CRMR)——犯罪率, 每十万人发生的刑事案件起数, 包括伤害犯罪率、抢劫犯罪率、诈骗犯罪率和盗窃犯罪率四类。之所以选用这四类犯罪率,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占有犯罪率的主要部分, 另一方面则因为其与经济活动的联系较为紧密, 与劳动投入的替代性也较强。数据以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为统计依据。

HR——人力资本存量变化率, 以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作为代理变量。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 常用的指标是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 (Barro & Lee 1996), 但在我国的统计实践中, 这一数据由于难以统计而无法获得, 因此本文将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而不是在校生数作为代理指标。

KR——物质资本存量, 为与其它变量保持一致, 本文以其增长率作为回归变量。物质资本存量按照张军等 (2004) 的永续盘存法估算, 其中 1978 年按当年价格折算后的物质资本存量为 7558 亿元, 1978 年后续年份的物质资本流量以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为计算依据, 剔除各年的价格因素后可得历年的物质资本存量。

#### (二) 假设验证

根据以上变量, 我们选取了 1981—2008 年的年度相关数据。其中, 各类公安机关立案的犯罪案件的初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法律年鉴》并根据“每十万人发生的刑事案件起数”计算各类犯罪率的总和。其它各类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基于这些数据, 在暂不考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情况下, 我们分别绘制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就业率和犯罪率、及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带回归的散点关系图, 见图 2。

首先,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方向一致的变化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如图 2(a) 所示, 从总体回归线上看,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较为紧密的拟合关系, 两者具有略微右上倾的线性趋势。不过略有不同的是, 农村劳动力转移体现出有别于

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即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快的扩大速度,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则上升较为平稳,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仍然存在有其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比如户籍制度、交通运输和思想观念等等,这些因素有可能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虽然如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关系仍然存在,即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也就越高,假设 1 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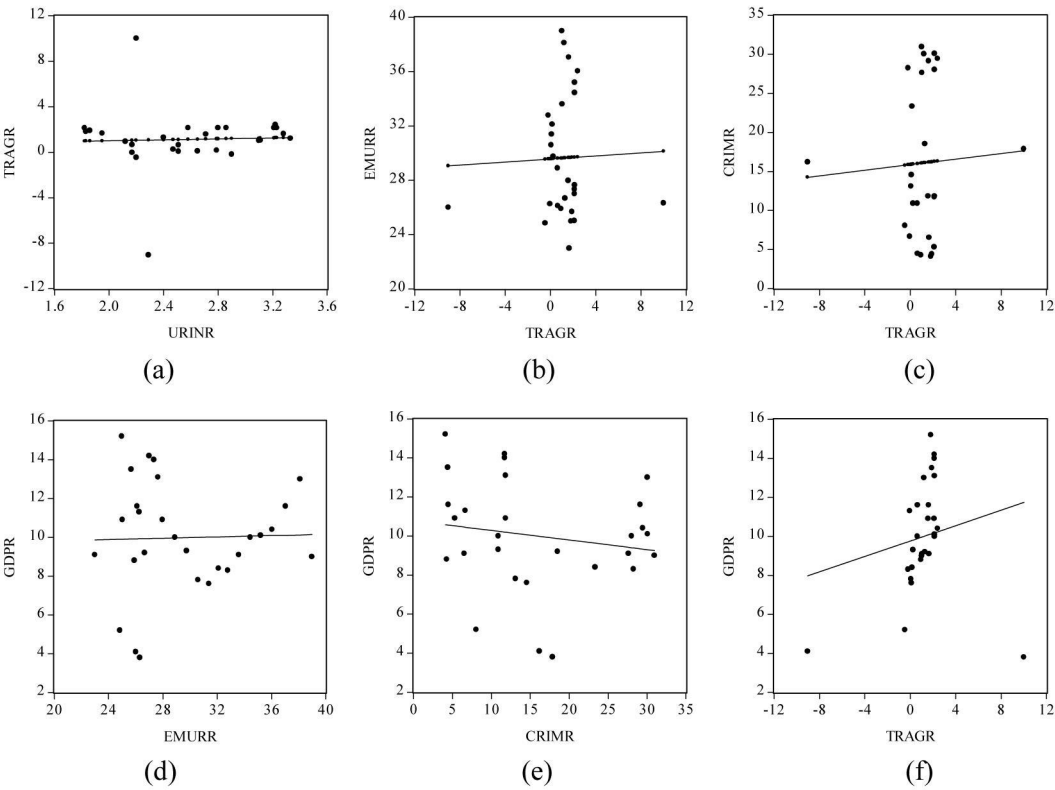


图 2 收入分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关系图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城镇就业占比,增加了劳动投入,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具有“激励效应”。如图 2 (b)和 (d)所示,城镇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与城镇就业均具有方向一致的线性变化关系。这一图示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越高,城镇就业量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假设 2 成立。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城镇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城镇就业的线性趋势稍欠明显。这是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相对繁杂,因此其波动也较为频繁,体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因此,两者变化趋势的不同使得经济增长与城镇就业的线性变化关系较为微弱。这给本文的启示是:在分析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绩效时,为使分析结果更为稳健和准确,应考虑其它可控变量,比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等。

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我国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效应”。如图 2 (c)和 (e)所示,刑事犯罪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正向的线性变化关系,而经济增长率则随着刑事犯罪率的上升而下降,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越高,刑事犯罪活动就越猖獗,经济增长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就越严重。犯罪活动的增加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图 2 (e)上便是经济增长率与犯罪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向线性关系。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我国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因而对经济发展具有“抑制效应”,假设 3 成立。

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既带来了“激励效应”,又产生了“抑制效应”,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

决于其净效应。图 2(b)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线性变化关系,即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双重效应中,相比于“抑制效应”,“激励效应”更具有主导地位。

四、实证分析

从统计数据的分析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犯罪活动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致验证了文中所提出的三个假设;但要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则需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及其估计

在计量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将设置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城镇就业占比和犯罪率的相应交叉项作为调节变量。之所以设置交叉项,是因为它不仅能有效地排除内生性问题,还能更好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就业和犯罪率的传递关系,更能揭示具有传递关系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共同影响。同时,为使模型更为稳健和准确,本文考虑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下,添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因变量为经济增长率。另外,为能更好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弹性变化关系,本文对相应变量取对数后,得到如下模型:

$$\ln GDP_t = \alpha_0 + \alpha_1 \ln HR_t + \alpha_2 \ln KR_t + \alpha_3 \ln UR^* ER + \alpha_4 \ln UR^* CR + \epsilon_t \tag{1}$$

$$\ln GDP_t = \alpha_0 + \alpha_1 \ln HR_t + \alpha_2 \ln KR_t + \alpha_3 \ln UR^* ER + \alpha_4 \ln UR^* CR + \epsilon_t \tag{2}$$

$$\ln GDP_t = \alpha_0 + \alpha_1 \ln HR_t + \alpha_2 \ln KR_t + \alpha_3 \ln UR^* TR^* ER + \alpha_4 \ln UR^* TR^* CR + \epsilon_t \tag{3}$$

其中,  $\alpha_0$  为常数,  $\alpha_1$ 、 $\alpha_2$ 、 $\alpha_3$ 和  $\alpha_4$ 均为回归系数,  $\epsilon_t$ 为残差项。

对取对数后的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只有  $\ln(HR)$ 、 $\ln(KR)$ 和  $\ln(UR^* ER)$ 是不平稳的,其它变量均分别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进一步地,对  $\ln(HR)$ 、 $\ln(KR)$ 和  $\ln(UR^* ER)$ 取一阶差分进一步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发现,各变量均是平稳的。在上述三个基本模型中,虽然各变量的平稳阶数不一致,但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并将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所有模型都是平稳的,见表 1。这一检验结果表明:虽然部分变量不是水平平稳的,但对其进行线性组合后却具有平稳性,因而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

总体而言,表 1所显示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较为理想。首先,从拟合优度来看,各模型均表现出较高的线性相关关系。如表 1所示,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最低的也有 0.7993 其它模型都在 0.8 以上,这一数据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各经济因素能够大部分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原因。其次,从 D-W 值的数据来看,除了模型 1 中的该数据偏小以致稍微偏离经验值以外,其它模型的数值均在非自相关检验的经验阈值以内。因此,各模型能够有效地拒绝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各模型在设置上是非自相关的。最后,从各变量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来看,除了模型 1 中的人力资本存量  $\ln(KR)$ 的回归系数不是很理想外,其它系数均能通过 10% 显著水平以内的 t 值检验。这就是说,在模型中,各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的。

(二)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绩效分析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添加收入分配等变量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强于人力资本。如表 1 中的模型 2 和模型 3 所示,物质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5022 和 0.4773 而人力资本变化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只有 0.2063 和 0.1979 远小于前者。之所以出现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比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是因为在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社会中,物质资本的积累程度将远高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Piket 1997),因此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的依赖性也就更强。其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高收入阶层拥

有较为丰裕的初始禀赋, 储蓄率较高, 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资本积累。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相比, 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大部分居民的大量收入被敛聚于部分人群中,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 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将高于前者, 社会储蓄率也相应较高, 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资本积累。另一方面, 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实际上, 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中储蓄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必要消费和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前提的, 因为更多的教育支出和培训支出被敛聚于高收入阶层的物质资本积累中。在这种情形下, 出于维系及扩大社会网络的需要, 高收入阶层将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但在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的社会中, 这一部分人力资本积累极为有限。由于物质资本积累率远高于人力资本, 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相对较大。

表 1 收入分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系数估计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Ln(HR)$	0.2229(1.7389)	0.2063(1.8774)	0.1979(1.8030)
$Ln(KR)$	0.0690(0.1762)	0.5022(3.9313)	0.4773(3.5647)
$Ln(UR * ER)$	0.7961(2.2201)		
$Ln(UR * CR)$	-0.5158(-3.4753)		
$Ln(TR * ER)$		0.4152(2.6097)	
$Ln(TR * CR)$		-0.3694(-2.4708)	
$Ln(UR * TR * ER)$			0.4335(2.6887)
$Ln(UR * TR * CR)$			-0.3794(-2.5486)
拟合优度	0.7993	0.8405	0.8522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0.7242	0.8266	0.8401
回归标准差	0.2771	0.2660	0.2639
D—W 统计值	1.4793	1.9619	1.8871
残差单位根检验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注:“( )”为回归系数的 检验值,“\*”表示在 10%水平内拒绝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

其次,在经济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正向的“激励效应”,又产生了负向的“抑制效应”,但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其中,“激励效应”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各自带来了城镇就业率的上升,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7961 和 0.4152 还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共同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其系数为 0.4335。“抑制效应”则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也相应地带来了我国刑事犯罪率的不断攀升,因而抑制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具体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犯罪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5158和 -0.3694 两者的共同系数则为 -0.3794 通过系数比较可知,在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双重效应中,“激励效应”略强于“抑制效应”,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并不支持 Barro(2000)关于低收入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抑制经济增长的观点,我们的解释是: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高额的储蓄率和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部分重要原因,其中,高额的储蓄率为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提供了雄厚的资本支持,而巨额的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马车之一;廉价的劳动力则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链转移提供了丰裕的劳动要素,在创造出口推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当说,中国的收入分配是出现高额储蓄率和廉价劳动力的主要制度性因素之一(李扬和殷剑峰,2005),这一模式使得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在中国的转型期,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是激励而不是抑制了经济增长。

实际上,收入分配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只是取决于 Barro(2000)所说的收入水平,更取决于其增长模式。在缺乏人力资本只能以劳动投入为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恰恰契合了其增长路径,因此在特定阶段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来看,依靠收入分配不平等下的粗放型劳动投入和巨额投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将使后劲严重不足。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应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机制,以积累人力资本,提高技术创新。

##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一种制度,收入分配如何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从劳动投入的角度,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至少从两方面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城镇就业占比的上升,满足了工业化进程的劳动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激发了各种犯罪活动的发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以此传导机制为研究思路,本文考虑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添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控制变量,分析中国经济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及其产生的“民工潮”现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激励效应”主要表现在由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仅使家庭成员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更为明确,还使其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得到延长和强化。因此,这一过程增加了劳动投入,促进了经济增长。“抑制效应”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激励了低收入阶层通过犯罪活动等非法途径获取社会财富,这不仅造成了劳动时间和精力的流失,更对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正向的,“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

第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高额储蓄率和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源自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一方面使高收入群体将多余的财富用于储蓄,从而为中国的固定资产总投资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积累在信贷约束的影响下严重不足,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两者都构成转型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并使经济增长对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走出这一路径,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应注意人力资本的积累,继续提高国民素质。

第三,我国的收入差距在经济转型期促进而不是抑制了经济增长,但其所引致的以高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回归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城镇就业占比的上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略强于犯罪活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缺乏人力资本只能以劳动投入为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恰恰契合了其增长路径,在特定阶段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应积累人力资本和提高技术创新,而缩小收入差距和完善分配机制是关键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促进而不是抑制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结论对于政策的启示并不在于鼓励扩大这一差距,而在于充分认识这一格局所契合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方向所在。另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刑事犯罪率上升的结论对于政策的启示也不在于阻碍劳动力转移这一过程,而在于正确认识居民收入差距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积极防范转移过程的不稳定因素,充分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 1 ] 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 5—32

[ 2 ] Barro R. J. and J. Lee. 1996 International Measures of Schooling Years and Schooling 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218—223

[ 3 ] Hu J. 2009 Intersectoral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Business Cycl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 Working Paper No. 402.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 4 ] Lewis W. A. 1958 Unlimited Labor: Further Notes[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 1—32

[ 5 ] Piketty T. 1997. The Dynamics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Interest Rates with Credit Rationing[ 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64: 173—189

[ 6 ] 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 138—148

[ 7 ] 蔡昉, 王德文, 都阳. 2001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 4—14

[ 8 ] 方秀娟. 2005 人口流动与社会稳定[ J]. 中国人口科学, 增刊: 39—43

[ 9 ] 胡鞍钢, 熊义志. 2000 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 特点、成因及政策[ J]. 管理世界, (3): 5—17

[ 10 ] 黄少安, 陈屹立. 2007 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基于中国 1978—2005 的实证研究[ D]. 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 11 ] 李勋来, 李国平. 2005 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 J]. 经济科学, (3): 39—43

[ 12 ] 李扬, 殷剑峰. 2005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2): 4—16

[ 13 ] 秦华, 夏宏祥. 2009 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2): 47—52

[ 14 ] 史耀波, 李国平. 2007 劳动力移民对农村地区反贫困作用的评估[ J]. 中国农村经济[ J]. 专刊: 20—27.

[ 15 ] 武国定, 方齐云, 李思杰. 2006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4): 63—70

[ 16 ]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2004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 J]. 经济研究, (10): 35—44

[ 17 ] 周靖祥, 何燕. 2009 城镇农村劳动力“吸纳”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基于 1990—2006 年省际所有制变革视角探析[ J]. 世界经济文汇, (1): 33—49

Study on the “ Incentive Effect ” and “ Depression Effect ”  
of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Li Zi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expansion of income gap and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on one side boosts the urban employment, on the other side arouses criminal activities, both of which influence economic growth. With trail of this, we use Neo—classic economic growth model to analyze their relationship and draw some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not only causes “ incentive effect ”, but also causes “ depression effect ”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 incentive effect ” takes hold. Secondly, China’s higher growth which relies on higher saving rate and lower labor price comes from incentive of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on physical capital, rather than human capital. Lastly, Chinese income gap promote rather than suppresse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but the extensive form of high input caused by it is not sustainable.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洪世键]